

博物馆请离我们更近些

追寻私家历史

有人在历史的浮沉

中打捞自己的家族史，

有人在抒发对故乡的眷

恋时引发共振

堂兄曾经在老家宗祠找到一本家谱。家谱上说，我们这一支浙江诸暨的陈姓发源自河南颍川，朝代已无法考。2009年，我去河南采访时，每到一座城市都会向当地人打听颍川。最终，在漯河和许昌交界的地方听人聊起了如今的颍河。有意思的是，去年和同事出差，这名来自福建的客家人告诉我，他这一支钟姓同样追溯至“颍川”，于家谱上也有记载。我们仿佛像重新认识了对方一般，“颍川陈氏”与“颍川钟氏”因为这特殊的缘分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

“我是谁？我从哪儿来？”这是每个人认识自己的必经之路。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人论》里说：在宗教生活的一切高级形式中，“认识你自己”这句格言都被看做为一个无上命令，一个终极的道德和宗教法则。而中国文化里强调的“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则更为看重传承的力量。

这种力量来自家庭、宗族、姓氏，历史的洗礼让每个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成为异客，认识自己便化作“客从何处来”的拷问。有人在历史的浮沉中打捞自己的家族史，有人在抒发对故乡的眷恋时引发共振。

台湾女诗人席慕蓉一直试图通过诗歌和散文表达对故乡的呼唤，我很爱听蔡琴吟唱她的出塞曲，“英雄骑马壮，骑马荣归故乡”。我的一位师长却告诉我，她最打动人的作品，都创作于回到草原之前。的确，她传颂最广的《七里香》、《无怨的青春》和《时光九篇》，都面世于她第一次回到故乡之前。1989年，46岁的席慕蓉终于踏上故乡的土地，这趟寻根之旅被她自己视为创作的分水岭。用女诗人自己的话来说，等待换来的是释放。

今年，我的一位好友参与了一档明星寻根电视节目的制作，她曾经苦苦追问：除了明星光环带来的猎奇心理，追寻“私家历史”的意义何在？这些故纸堆能够吸引观众么？带着这种纠结的情绪，她休假回了趟老家，听村里的老人说起了父亲年轻时的经历，看到了一个她不曾触及到的父亲形象。她突然明白：生活中很大一部分都在重演，谁都没有比祖辈们高明多少，如果不是他们，我们根本不会站在这里。

“祖先将用一生和过往给我们一些经验和教训。”她说，历史拐了一个弯，湮没掉了许多人的一生。我们像一台老式的放映机，将他们的一生重新组合放映，看他们在那个弯里如何挣扎，有些登陆、有些沉没，但没人敢说他们失败，他们在子孙的注视下，获得新的荣耀。前一代人阅过的风景，在后一代的视野中徐徐展开，跨越时空找寻彼此之间的联系，最终成为了她做节目的动力。

你从何处来？被人赋予丰富的答案形态。吴冠中画里的白墙黛瓦如是，余光中诗里的那一瓢长江水也如是；当然还有让后人打上故乡烙印的柳河东、韩昌黎、王临川。

我从何处来？别人不能接受，你却甘之如饴的臭豆腐和臭鳃鱼，最能温暖你的胃的终究是一碗手擀面还是棒渣粥，你学会了儿化音却经常忘记平翘舌。个人是历史的个人，一切个人史最终组合演变成了大历史。拨开层层薄雾找到自己的来处，每个人，其实都在书写着自己的《回乡偶书》。



观众对博物馆的要求已不再满足于观光式看展，他们更期望与藏品走近一些，借智慧来与展品对话

## 博物馆 别让我们看不懂

□ 李 丹

“看展览就怕看不懂。”不少人有这样的感受。在我们的观展感受中，“看不懂”似乎挺常见。

“有一次我去美术馆看雕塑展览，雕塑旁边的小牌子只有作者名字和雕塑名字，完全不介绍雕塑的材质，看着像木材，也像金属，说不定是石材呢？各种材质的特性不同，办展览的不介绍，观众怎么知道啊。”说起那次观展，李女士至今都觉得遗憾。

“看不懂”与参观者的知识结构、知识储备有关，当然也与博物馆、美术馆的策展布展密切相关。博物馆面对的观众绝大多数是非专业人士，要让普通公众获取知识、增长见识，首先就要让公众看得清楚、看得明白，让策展布展的方方面面更细致、更人性化，把为观众服务这根弦绷紧。

### 有创意 不落伍

不管展览采用了哪些形式，最能打动人心的是在策划中融入设计感与创意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奥林匹克公园附近的中国科学技术馆。场馆足够大，展览也不少，孩子们更是兴奋。但参观了一圈之后，心中总有一股怅然若失之感。在观众休息区，一位家长与记者有相似的感受：展品的解说词太过刻板，直接照搬教科书，别说是孩子，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家长也看不懂。记者在参观时也发现，很多静态的展览并不能吸引观众，孩子们在一些互动项目前排起了长队，博物馆变成了“游乐场”，很难说一趟博物馆之旅能给他们留下多少印象。

这让记者想起了几年前第一次参观首都博物馆时，遇到过一位在首博从事青铜器研究的研究员。她在为观众讲解青铜器的器型特色时，并没有照搬书本上繁复的概念，而是绘声绘色地讲起了故事。她讲到商代青铜器上经常出现的“饕餮纹”时说，“饕餮”是一种特别贪吃的怪兽，它会把周围的一切东西都吃光，还不满足，再从自己的尾巴吃起，吃到只剩下两只眼睛。所以出现在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都是以两只眼睛的形

式出现。从她娓娓道来的讲解中，观众们明白了鬲、豆等青铜器不同器型的区别，也将青铜纹饰的故事深深刻在了记忆里。

在博物馆，观众看的是展品，透过展品还能了解其背后的种种典故、常识。毕竟展品只是一个物件，光是观赏未免枯燥；而故事鲜活，总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和丰富的想象。相信每一位参观博物馆的观众，都盼望着能碰到一位懂行又善谈的解说员，跟着他一路参观下来，能获得不少知识不说，说不定还能激发你进一步研究的兴趣。

看了国内外不少展览，小陈对台湾国立博物馆的一场历代帝王展印象最为深刻，尤其是其中恰到好处的解说词，一下子拉近了千百年前的历史文物与现代人之间的距离，让他倍感亲切。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博物馆处处长郭长虹表示，过去中国的老百姓更爱看“精品展”，因为一下子能看到许多“国宝”。但是随着国内观众对博物馆的熟悉程度越来越高，他们的品位也水涨船高，从“看热闹”变成了“品文化”。单纯的“国宝展示”已经不能满足他们的欣赏需求，一些编排巧妙的专题展览越来越受观众的欢迎。因此，不论是专题展览还是常设展，不论运用什么样的高新技术，只有在策划中融入设计感与创意，这样的展览才不落伍。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物联网、声光电等技术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博物馆展览中，给观众增加了不少新奇体验。不过，再先进的技术也只是手段，要想真正让展品与观众互动起来，则需要策展者更多精彩的创意。

### 讲故事 不炫技

通过特殊的布展手法，可以让展品自己开口“讲故事”

由于博物馆人手有限，观众不可能次次都能碰到懂行的讲解员，于是一些博物馆、美术馆在布展时，就充分发挥了展品自己“讲故事”的能力。

前不久，《艺为人生——冯法祀百年诞

辰艺术回顾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展。在向观众展示上世纪50年代冯先生创作的大型油画《刘胡兰就义》的同时，美术馆专门开辟了一大片展区，通过大量的创作稿、写生稿展示，为观众们展现了一幅大型油画创作的全过程。

透过这些原始画稿，观众近距离地感受冯法祀为了创作这幅油画所付出的艰辛：他曾多次去刘胡兰的老家山西省文水县云周西村收集资料，与刘胡兰的亲属见面、交谈。他绘制了云周西村村头、云周西村的雪地，也为场景中的人物设计了各式各样的相貌衣着，就连匪军军官和告密者的神态动作，都进行了精心设计，这些都体现在近百幅的创作稿之中。冯法祀曾说，在创作现实主义作品时，“画家就像一个导演，你得学会安排画面，并且要考虑怎样把观众的视线引到你的思想中来”。通过一幅幅的原始画稿，观众们看到了冯法祀如何像一个导演那样安排创作。

在博物馆适当增加一些表演项目，同样是一种“讲故事”的手段，能给观众带来更为全方位的体验。相信前往南京云锦博物馆参观的观众都很好奇技艺复杂的云锦是怎么织出来的。于是，在云锦博物馆二楼，最吸引眼球的就是那十几台木质织机和现场的织锦技艺展示。两位织锦师傅在大家的瞩目下，共同操作一台织机，合作织出复杂的图案，整个过程是观众单凭图片、实物和讲解很难理解的，但是现场展示就让人对云锦有了更深的了解。

通过特殊的布展手法，可以让展品自己“讲故事”；尤其让静态的展品真的开口“说话”，则非要借助现代科技的手段不可。在国家博物馆，只要用手机扫描文字介绍旁边的“二维码”，就可以收听展品介绍等导览信息；而借助大数据收集和分析，国博也可以掌握不同展览的观众流分布，从而更好地优化展览内容。苏州博物馆则在展览中综合运用了各种科技手段，如语音导览、APP、微信平台等，让观众对展品有一个全方位的体验。

科技手段虽然能给观众带来许多新颖体验，但它是博物馆展览的一种辅助手段。“如果过分利用科技手段，就变成了炫技。”

郭长虹说，在信息化条件下，观众如果想了解一件文物，上网就可以了，为什么非得要去博物馆呢？“观众去博物馆，看的就是‘真东西’。因此博物馆的最主要原则就是要为观众创造一个能更好体验文物原真性的场所。”

### 重教育 无门槛

作为公共文化设施的博物馆，应当为各类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提供人文关怀和文化体验

著名画家施大畏曾讲过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一次他去法国梅兹的蓬皮杜艺术中心考察时，看到一位年轻的妈妈在给年幼的女儿买国际大师夏加尔的画册。他好奇地问这位母亲，小女孩是否能看懂？母亲坚定地说，“孩子喜欢，我想从小培养她的兴趣，相信对今后的成长肯定有好处”。

正像这位母亲的做法一样，在西方一些艺术传统比较浓厚的国家，中小学生几乎是伴着博物馆一起长大的，许多课程都安排在博物馆里上。“美育是需要从小潜移默化培养的。”施大畏说，我国虽然已将音乐、美术、书法等纳入教学大纲，但艺术美育不应仅仅局限于艺术技艺层面，它有更丰富的内涵，从感知入手培育艺术的基本素养，并逐步上升为鉴赏和创造。他建议，应充分利用博物馆、美术馆等各类公共文化设施，使之成为校外提升青少年艺术素养的现场课堂。

近年来，我国相关教育部门也越来越重视博物馆在塑造孩子美学理念中的重要作用。但相关专家表示，受条件所限，许多博物馆难以同时接待大批学生上课，于是学校采取了更为机动灵活的方式。如北京市东城区规定中小学生每学期都要参观一定数量的博物馆展览；上海市还发放了中小学生成长记录卡，要求学生每学期都要刷够一定数量的博物馆参观次数。不过相比博物馆授课，这样的自由方式在知识传授效果上会差一些。

然而，一个不无尴尬的事实是，博物馆天然属于城市，好的博物馆更天然属于大城市。想让更多农村、偏远地区的孩子像城里的孩子一样经常能到博物馆接受艺术熏陶，一方面要靠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推进，另一方面相关的技术手段也不可或缺。郭长虹说，许多地方正在探索通过远程教育方式，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参与博物馆课堂。通过博物馆的老师与学校老师的互动讲解，孩子们虽然不在现场，却有身临其境之感。

“作为公共文化设施的博物馆，应当为各类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提供人文关怀和文化体验。”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对于残障人士来说，他们更渴望走出家门、学习知识。就近、就便参观博物馆，是他们平等、充分地参与社会生活的良好契机。如今各类博物馆虽配备了残疾人绿色通道、轮椅等无障碍设施，但仍需在软件上提升对残疾人的服务意识，拓展服务范围。

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当天，中国残联和国家文物局共同发布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博物馆进一步深入开展面向残疾人的多样化文化服务，为残疾人创造更加良好的参观、学习和信息获取环境。

也是在这一天，南京博物院的“博爱馆”正式开放。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为视力障碍人士服务的博物馆展区。在这2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视力障碍人士可以近距离触摸文物仿品，每件展品前还设有盲文机和智能感应系统，观众一靠近，就能自动进行语音介绍。即使是全盲观众，也可以坐在“视障全自动导览车”上，由车子带领进行触摸，省却了找路的烦恼。